第一章 绪 论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和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中世纪的中国,在唐代创造了历史上第二个辉煌时期,盛唐的成就,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发展，也极大地扩大了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在世界上的影响。中国学术的发展，与历史的发展相适应，显示出明显的阶段性。先秦时期是从学术的萌芽到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诸子学渐次发达。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的建立，学术的发展也出现了统一的趋向,从秦代和汉初的综合百家到汉武帝独尊儒术,奠定了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主导地位,儒学成为中世纪学术的主流。魏晋以降,社会陷入分裂,学术思想也不再是儒学的一统天下,玄学、道教、佛教逐渐兴起,与儒学一争短长。到了隋唐,国家重新获得了统一,统治者为了政治的需要,在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时候又抬高儒学的地位,但是,经历了魏晋之后的冲击,儒学的缺陷与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无法以绝对的优势压倒其他学说，于是就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立的局面。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学术的这三大主流学派的构成和鼎立，就是在隋唐时期确定的。

一、隋唐学术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

1. 隋朝的建立与国家的统一

经过汉末到南北朝长达 400 余年的分裂与战乱，除了西晋短暂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统一时期之外,中华民族饱受战争之苦,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大量土地荒芜，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破坏。特别是中国经历了秦汉大一统之后，那种统一的中央帝国的赫赫声威已经成为中国人的骄傲。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确立的与中央集权专制社会相一致的统治思想和社会意识形态，也已经成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因此,即使在分裂与动乱中,中华民族也始终没有放弃对国家统一的追求,而是将它作为实现统一的手段。实际上,国家的分裂与动乱在没有放弃追求统一的情况下，是社会政治力量的分化瓦解和重组。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旧的腐朽势力被淘汰,而具有活力的新生力量则迅速崛起。在几百年的纷纭斗争中,各个民族、各种政治势力都在争夺统一国家的领导权，这一地位最终被隋朝的杨氏获得。

580 年,北周宣帝死,其子宇文阐年方 8 岁,继为静帝,由丞相杨坚辅政。

杨坚的父亲是北周的开国功臣,十二大将军之一,赐姓普六茹,封随国公。杨坚袭父爵职,历任大司马、大后丞等,他的女儿是周宣帝之后,所以,杨坚不仅位高权重,而且是皇亲国戚,是宣帝之国丈、静帝之外祖。同时,他又出身于世族之家,这两种条件使得他不仅得到了北周鲜卑贵族的信赖,而且也受到中原汉族政治势力的大力支持,故很快掌握了北周的最高权力。他重用高颎、刘昉、郑译等人帮助他策划篡周。北周旧臣和鲜卑贵族势力风闻杨坚准备篡周，纷纷起兵勤王，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等先后而起,但均被杨坚平息。他还将北周诸王召集到长安予以监控，并先后伺机杀害。580 年底,杨坚被封为随王,夺取政权的一切障碍都已全部扫除。次年(581 年)二月,周静帝下诏禅位于杨坚,杨坚受册即皇帝位,建国号为“隋”,是为隋文帝。①

①杨坚父子均封随国公，杨坚更被封为随王，故建国时就以自己的封号为国号。但以“随”字中有带“走”的偏旁,以“走”为不吉,便去“走”而变为“隋”。

杨坚从北周手中夺取了中原政权,就着手准备统一中国。当时,与隋朝并存的还有江南的陈朝和后梁。杨坚建国之初，并没有马上从事南征,而是把精力放在稳定政权、消灭异己和对付突厥等问题上。如他即位不久,就杀尽北周诸王和静帝。同时,也为灭陈和梁做了积极的准备,派遣隋军名将贺若弼任吴州总管镇广陵(今江苏扬州)、韩擒虎任庐州总管镇庐江（今安徽合肥），形成夹击陈朝京城建康（今江苏南京）之势。

后梁本来是投靠北周建立的一个弱小政权，一直臣服于周。隋代周后，梁仍然对隋纳贡称臣。开皇七年(587 年),隋文帝命梁帝萧琮入觐,萧琮率臣下 200余人来长安，隋文帝宣布废除后梁。留驻江陵的梁臣萧岩等携百官民众 10 余万人降陈,后梁灭亡。

开皇八年(588 年)三月,隋文帝下诏宣布陈后主 22 条罪状,声称将发兵征讨,并将这份诏书传写 30 万份,在陈朝境内广为散发,进行强大的舆论攻势。同年八月，隋设淮南行省作为征陈的基地，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和大臣杨素等为行军元帅，以高颎为晋王元帅长史，分兵八路,出动水陆大军 50 多万，准备在数千里的战线上向陈发起总攻。面对严峻的形势,陈国君臣却自恃长江天险,依旧饮酒作乐,毫无戒备之心。次年正月初一日,陈国欢庆新春之时,隋军发动全面攻击,陈后主仓皇对阵,经过多次战斗,隋军终于攻克建康,陈后主被俘投降。至此，从西晋之后长达 400 年的分裂结束，中国重新获得了统一。

隋文帝统一全国之后,大力进行政治整顿和改革,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巩固中央集权制。他所创立的许多制度，对后世都有重要影响。范文澜先生曾经这样评价过隋文帝的改革:"隋文帝主要的功绩,在于统一全国后，实行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使持续三百年的战事得以停止，全国安宁，南北民众获得休息，社会呈现出空前的繁荣。秦始皇创秦制，为汉以后各朝所遵循，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秦、隋两朝都有巨大贡献，不能因为历年短促，忽略它们在历史

上的作用。’① 范先生的这种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经过十六国南北朝的长期分裂，汉代建立的一些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各个政权都建立了自己的制度，有些还带有少数民族的一些习惯。国家统一之后，亟需一个与统一相适应的健全的政治制度，隋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励精图治，建立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政治制度，对中世纪后期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有着积极的作用。这些措施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重新确定官制。隋朝统一全国之后，原各地方政权的官职五花八门，隋初，朝廷对以往各朝各代的官制进行了综合改造，确定了新的官制。在中央政府，废除北周仿《周礼》设置的六官，恢复汉魏的三师三公，置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和内侍五省，以尚书省主理政务，下设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后改刑部）、度支（后改民部）和工部六曹。门下省掌管政事的审议，内史省专司出纳王言、草拟圣旨，秘书省负责图书著作，内侍省主管宫廷事务，以前三省为辅助皇帝处理国家军政大事的机构，并互相牵制，以防止内侍和外戚擅权弒夺。在地方官制方面，废除郡一级行政机构，只设州、县两级，并省河县，裁减冗员，禁止州县首长自行任命僚属的制度，规定凡九品以上的地方官吏，一律由中央朝廷直接任免，并实行三年任期制，县佐回避本郡等制度。

第二，废除九品中正制，兴科举考试制度。汉代官吏的铨选是根据人的德才由地方荐举，到魏以后就演变成了九品中正制，即根据人的出身门第的不同，将人分为九个等级，按照门第等级授予相应的官职，从而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开皇七年（587年），隋朝采取新的铨选政策，规定各州每年选3人参加朝廷秀才、明经等科的考试。开皇十八年（598年）增设举人，炀帝时又设进士科，科举制度

①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4页。

基本形成,后来经过唐代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就成为中国中世纪后期官吏铨选的根本制度。

科举制的设立，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打破了血缘家庭的门第等级，让所有的学子都有了通过自己的刻苦学习进入社会上层、加入统治集体的可能性。因而,在平民与社会上流之间,就没有形成不可逾越的鸿沟。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把入仕作为学习的根本目的，科举制度就给它们提供了一个相对比较公平的机会,激励知识分子努力学习,主动关心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大事,学而优则仕,格物致知最终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这种选官制度,客观上促进了治国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和社会的关心，培养了他们高远的志向和高雅的情怀。

第三,修改刑律。汉代废除秦朝的严刑酷法,以简约治天下。魏晋以后,各国蜂起,刑律渐乱。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将其部落中的一些残酷刑法移植到中原,名目繁多,轻重失衡。隋朝建立之后,综合历朝旧律,重新制定法律条文,废除了枭首、宫刑、车裂等残酷野蛮的刑罚,定死刑、流刑、徒刑、杖刑和笞刑,死刑仅留斩、绞二法,定‘十恶不赦’之罪,删繁去冗,形成了《开皇律》。为了防止错判、误判,苍天还规定,诸州县对于死刑一律不得独断,必须上报大理寺复核。《开皇律》的立法精神和简约的法律结构,后来成为唐、宋、明、清诸朝法律的蓝本。

第四,均田减赋。在长期的战乱中,社会的经济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的破坏,不少百姓流离失所。国家统一之后,政权的巩固,社会的安宁,都需要重建和平稳定的秩序,而这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百姓的安居乐业。所以,隋朝统一全国之后,于开皇二年(582 年)即颁布均田令,计口授田。均田制的贯彻有利于限制豪强趁社会动乱之机强占民众土地,并保证了百姓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在实行均田制的同时,隋朝还进行了减轻赋税的工作。从隋朝规定的赋税来看，比南北朝时期轻了许多，而且随着社会的逐步复苏和发展，隋朝还不断地减免百姓的赋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这种政策,不仅保持了社会生活的安定,而且为百姓的生活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广大民众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隋朝初年的这些改革,是国家统一的积极成果,它对于中央政权的巩固、社会的复苏和生产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当时,国家的府库充盈，国力强盛，到了唐代仍然被唐太宗李世民君臣称道。可以说，没有隋朝的国家统一与社会复苏，就没有中国唐代的盛世。

2．贞观之治与社会的发展

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逝世,炀帝杨广即皇帝位,他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荒淫残暴的君主,在他统治期间,不仅生活骄奢淫逸,而且好大喜功,对百姓极尽剥削之能事,对外炫耀武功,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他游幸江都,奢侈已极,仅拉船的民夫就达8万余人。① 修运河、建东都,动辄征夫上百万,又发兵征高丽;“秋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息,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② 民怨沸腾，终酿隋末社会暴动。大业十二年至十四年(616—618年),承十六国南北朝之余绪,各地武装势力建立国号者达数十个,中国在经历了极短暂的统一之后又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唐朝的创立者在这种动乱之中收拾残局,建立了大唐帝国。

唐朝统一中国之后,面临的一个最严峻的问题,就是如何恢复社会的秩序和生活的安定、促进国家的复苏与繁荣。李氏建唐之后,经过残酷的政权斗争,终于由一代人雄李世民登上皇帝宝座,他在位期间,采取开明的政策,促进经济的发展,注意处理好与各民族的关系,励精图

①参见《资治通鉴》卷180《隋纪》四。

②《资治通鉴》卷181《隋纪》五。

治,勤政爱民,致力于社会的安定与发展,终于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代盛世。吴兢曾经写过一段话，记载了唐太宗李世民治国安邦的大致情况：

>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初,息隐、海陵之党,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时论以为能决大事,得帝王之体。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毫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民。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在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馈赠。此皆古昔所未有也。”①

可见，唐太宗是在满目疮痍的社会状况下接管国家的统治的。从隋炀帝大业十二年(616 年) 到唐武德八年(625 年),中国社会继汉末以来400 年动乱之后仅历 30 年的短暂安定,又陷入动乱之中。唐太宗面对这样的社会状况,以振兴经济、安定国家、促进社会发展为己任,兢兢业业,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开创了唐代的辉煌。

唐太宗特别注意吸取隋朝覆亡的经验教训,居安思危,深知‘战胜易,守成难’,无论什么事情,朝臣们进谏时只要提到隋朝的覆亡,就会

①吴兢：《贞观政要》卷 1《政体第一》。

引起他的高度重视，并立即改正自己的错误。正因为这种以隋为鉴的高度自我警觉,唐太宗才能够励精图治,从善如流。

唐朝建立之后,社会亟需从战乱中复苏,统治者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医治战争给民众带来的创伤，招徕和安置流民，使百姓安居乐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唐朝统治者继承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改革与完善:“唐之始时,授人以口分、世业田,而取之以租庸调之法,其用之也有节。盖其蓄兵以府卫之制,故兵虽多而无所损;设官有常员之数,故官不滥而易禄。虽不及三代之盛时,然亦可以为经常之法也。”①

均田制是北魏以来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一种制度。社会动乱之后,不仅会有大量的人员伤亡,而且会有不少人流离失所,从而造成土地占有情况的不平均,出现有田而无人耕,有人而无田可耕的现象。政府实行均田制就是要使土地与人各尽其力，从而把民众与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生死无徙于乡,促进社会的安定与生产的发展。当然,所谓均田是对百姓而言的,他们不可能在土地占有上与统治阶层相“均”;唐朝规定亲王永业田 100 顷,一品官 60 顷,此外还有职分田。不过,均田制的实行,毕竟解决了百姓基本的生产资料问题，使他们的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一个成年男丁授田 1 顷相当于今制 16 亩,以之养家糊口,足以度日,而且朝廷采取“贫及有课税者”先授,优先照顾贫困户,足见这一政策确有扶弱抑强的意向。

所谓租庸调是一种赋税制度。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租”为每丁(21—59 岁的男人)每年向国家交粟 2 斛或稻 3 斛,而每年交丝绢 2 丈、绵 3 两、布 2 丈 5 尺、麻 3 斤为“调”;每丁每年服徭役 20 天或每日徭役折绢 3 尺为“庸”;若加役 25 日免调,加 30 日租调全免,且总数不许超过 50 日。这种负担在当时的情况下还能够被百姓接受:“太宗方锐

① 《新唐书》卷 51《食货志》。

意于治,官吏考课,以鳏寡少者进考,如增户法……异物、滋味、口马、鹰犬,非有诏不献。如加配,则以代租赋。其凶荒则有社仓赈给,不足则徙民就食诸州。’① 举凡一切措施都是为了安民利民。

在政治上实行并省裁冗,撤销、合并行政区划,严格控制由中央直接任命的官员的数量，消灭民少吏多的现象，建立正常的道州府县制,减轻民众的负担。此外,唐太宗还实行府兵制,在和平时期军队从事农业生产，自己供养自己，以减轻民众的负担。

这些改革措施被他的后代奉为定式,经过几百年的努力,唐代社会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首先，农业生产得到长足的恢复与发展。均田制的实行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们大力开垦荒地,扩大耕种面积。政府为了农业增产丰收，多次大规模兴修水利。如武德七年(624 年)白龙门引黄河水,灌溉韩城农田六千多顷 贞观年间在朔方开延化渠、江都引雷陂水、开河中龙门渠,后来又多次开渠引水,使许多干旱的农田得到了充足的水源。唐朝历届政府都注重水利工程的兴建,据不完全统计,唐高祖时期 9 起,太宗时期 28 起,高宗时期 45 起,武周时期 17 起,中宗时期 6 起,睿宗时期 2 起,玄宗时期 58 起,肃宗时期 1 起,代宗时期 13 起,德宗时期 32 起,宪宗时期 24 起,穆宗时期 14 起,敬宗时期 4 起,宣宗时期 3 起,懿宗时期 12 起,僖宗时期 1 起,其他无考 10 起。以上仅见于史载者共 291 起。同时，又积极改进农业生产工具，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的效率。经过百余年的努力,农业生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出现了‘ 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岭,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 ’② 的局面。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与繁荣，粮食价格逐步下降，比隋代降低了 80% 左右。隋

① 《新唐书》卷 51《食货志》。

② 《元次山集》卷 7《问进士第三》。

时斗米值百钱甚至数百钱,到唐开元间,斗米十五钱,最低的地方只卖五钱。民众的温饱已经不成问题。

在唐代，人口的数量也在持续地快速增长。唐初时，全国仅有户200余万,高宗时已有380万，20年间增长1/4。① 唐朝鼎盛时有户约1400万,人口近7000万。这种人口的快速增长，也是唐代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

其次,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之上,唐朝的手工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当时的温州、寿州、洪州、越州、鼎州、婺州、岳州等地已经成为著名的陶瓷生产基地。唐三彩至今仍然具有很高的工艺价值。日常生活用具的手工艺品种类繁多,制作精良,如纺织品有布、绢、绫、罗、绸、锦等种类,而每类之中又有许多不同的品种,如绫的品种就多达数十种。当时定州(今河北定县)何明远家有绫机500张,规模甚为庞大。在采矿业方面,当时政府与私人共同开采。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仅平陆县就有"银穴三十四,铜穴四十八";《新唐书·食货志》载:"凡银、铜、铁、锡之冶一百六十八。陕、宣、润、衢、信五州,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锡山二,铅山四……麟德二年,废陕州铜冶四十八。"上述五州,分处今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等五省,全国各地都在大力开采矿产资源。与此相适应，冶炼与铸造业的生产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无论是大型铸造还是精雕细作,其艺术水平之高,令人叹为观止。如武则天时以铜铸天枢，高105尺,经12尺,八面各长5尺,下为铁山,其围170尺。上面饰以铜制蟠龙、麒麟,设腾云承露盘,直径3丈四龙立柱火球,高1丈。近年来不断发掘出来的唐代金银玉器,其技术与艺术都堪称一流,已经运用了铸、切削、抛光、焊、铆、镀等

①唐初的人口数量比隋时低许多，这一方面有战争的伤亡，另一方面也有流民迁离原籍。高宗时的人户统计，当包含有流民变为编户的数字，不能简单地看做是人口的净增长。但是，尽管如此，这种统计数字的增长仍然是社会安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征。

工艺。这种手工业的发展与发达，充分反映了唐代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的繁荣。

再次,商业的兴旺。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使整个社会有了丰富的剩余产品，人们把这些产品拿到市场上去交易，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兴旺。唐玄宗天宝年间，长安建立了东西南北四大市场，每市方 600 步，四面各开二门,以墙围之,市内东西南北各有二条街道纵横交错,街宽 18—30 米。每市内有店面数百至数千不等。这个规模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颇为壮观的。除长安外，全国各地都有类似的专门交易的市场,如东南名城杭州“开肆三万”;政府不仅设立市场,而且还对市场进行规范化管理,什么时候人市、闭市,商品的等级、价格,交易的程序和税收等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市场的发达产生了一个必然的结果,那就是货币的流通加速。唐代以前虽然有货币的存在,但流通不广,商业活动中主要是以物易物。唐代虽然也保留着以实物为货币(如布帛、绢等)的现象,但金属货币(铜币和铁币)也开始大量流行,并随着交易范围和区域的扩大而产生了专门从事信贷业务的店庄和类似于汇票的“飞钱”“便换”,它实际上是可以兑换的银票的雏形。

此外,随着国内市场的繁荣,中外之间的国际贸易也有了迅速的扩大。不仅传统的西域市场得到进一步的拓展,而且阿拉伯人、波斯人也从海路进入中国东南部一带进行贸易，促进了古代中国与外国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交流。

3. 文化繁荣与学术的兴盛

在中国历史上,唐代是一个值得中国人骄傲的朝代,当时的经济繁荣盛况空前,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上,也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唐代在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像其经济的繁荣一样,也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所瞩目。盛唐的繁荣促进了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往,正是在这种交往中,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国传统文化积极吸收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自己,并通过这种文化的交往,扩大了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影响,树立了中国文化的声威。

盛唐政治的稳定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经济的繁荣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民族的融合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这种形势下,唐代的文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永为世人景仰。

在思想方面,唐代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儒家经典的整理与注释即经学的发展。以孔颖达和陆德明为代表，他们在汉儒高祖的基础上对儒学的主要经典做了详细的注释和校正，为后世理解和进一步发挥儒家的思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孔颖达的《五经正义》、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至今仍然是治儒学史、经学史者重要的参考资料。二是儒、释、道三教鼎立。唐朝建国后,因为皇帝姓李,便着力扶持道教,高宗时,敕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画老子像颁行天下,尊《老子》为《道德真经》、《庄子》为《南华真经》,并在科举考试中专门设立了老庄道家、道教的考试科目。在朝廷的大力提倡下,道教作为中国本土的宗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时间,两京和天下各州府皆立玄元皇帝庙,观场遍于全国。黄巾羽士充塞道路,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隋唐时期达到了它的顶点。从教理上说,隋唐佛教改变了南北朝时期北专禅定,南重慧观的分歧,提倡‘止观并重,定慧双修”,从理论上实现了南北的统一。唐代时,组织大规模佛教经典的翻译工作,专门设置译场,分工负责,翻译了大量的佛典。这些佛教经籍的翻译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和演变打下了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正是在这些经典的研究之中，深化了中国佛教徒对印度佛教教义的理解，也由于各自对佛教经典义理上的差异，佛教在唐代就形成了诸多的宗派,并具有明显的中国本土文化的特点。其著者如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禅宗等。特别是禅宗这一完全中国化佛教的产生,说明中国佛教

已经形成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唐朝在提倡佛道的同时，也推重儒学。唐太宗尊孔子为“先圣”，广增国子学生员，有通一经者，即可参见贡举，特别是科举考试制度的完善，更引导知识分子“抱负典籍，云会京师”。史称“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① 儒学的发展除了经学的成就之外，刘禹锡、柳宗元、韩愈、李翱等人，对儒学的思想发展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儒、释、道三家并行于唐，三教鼎立，相互诘难、相互吸收、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共同创造了唐代的思想成就。

在文学方面，唐代的诗歌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成就。唐初的宋之问等人在前人音韵成就的基础之上，完善了律诗的音韵格式，古诗乐府、近体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绝句、排律等多种形式的诗歌同时流行，特别是一批著名的诗人，一扫六朝粉黛之气，以文学的形式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表达了对百姓疾苦的关心和对国家的热爱。如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李贺、岑参、高适、白居易、杜牧、李商隐等人的诗作，都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唐朝诗歌之盛，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唐诗流传至今的还有近 5 万首，作者 2000 余人。文学方面的第二个成就是古文复兴运动。南北朝时期，骈文流行，以辞藻的华丽、意境的缠绵悱恻为尚，所述者多为春花秋月。到了唐代，学者们开始反对这种绮丽轻浮的文体，提倡恢复秦汉时期的古文体，到了韩愈，就把这一运动推向了高潮：“愈所为之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② 这种朴实的文体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文学方面还值得一提的是唐代的传奇小说也十分发达，像《古镜记》、《海山记》、《红线记》、《霍小玉传》、《柳毅传》、《南柯记》、《莺莺传》等，都在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如元稹的《莺莺传》后来经过多次演绎，最终形成了王实甫的《西厢记》。

① 《旧唐书》卷 189《儒学上》。
② 《旧唐书》卷 160《韩愈传》。

这一时期的史学成就也十分突出。由朝廷监修的就有《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和《隋书》,还有《南史》和《北史》的编修也获得朝廷的钦准。汉以后四百年的历史，都在唐代进行了整理和记载。历代编修的二十四史,在唐代就编了八部,史学成就的辉煌,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比拟的。受唐代编修历史的影响，此后历代的正史都由朝廷监修，保证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有了完整的规范记载。中华民族奋斗、发展、前进的历史脚印得以清晰呈现,此例实开自唐。

唐代的艺术也有令人瞩目的成就。由于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大量塞外民族的民族文化和艺术流入中原,加上唐朝对外交往的频繁,外国的一些文化艺术也传入中国。如唐朝综合各种乐曲,定十部乐,分别为燕乐、清商、天竺、西凉、高丽、龟兹、安国、疏勒、康国和高昌。舞蹈的形式也和声乐一样丰富多彩。其著者如剑舞、胡旋舞、霓裳羽衣舞等,都流行于当时。唐朝的书画艺术也有相当大的成就,虞世南、张旭、颜真卿、怀素、柳公权等人,不仅是一代名家,而且至今仍然是书法的宗师。张彦远作《历代名画记》,收唐代画家达 206 人。特别是敦煌石窟,更是集绘画与雕塑于一体,展现了唐代艺术的辉煌成就,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总之，唐代的文化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这些成就的取得,既与盛唐社会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密切相关,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个民族的文化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结果,是全中华民族的共同创造。同时，它也是中外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吸收的产物。当时传入中国的外来文化，不仅有对中国社会影响极大的印度佛教文化,而且还有西方文化,如景教(基督教的一个教派)、波斯的摩尼教和祆教、阿拉伯的伊斯兰教等,它们在唐代都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

二、隋唐学术发展状况

学术的发展植根于现实的生活，孕育于思想和文化的发展。隋唐学术的发展，也是当时社会生活现实的反映，并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兴衰、君王的爱好等等，都对学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1. 国家的统一对学术发展的影响

在国家分裂时期，社会生活处于一个多元发展状况，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存在着多个中心，因此，在学术上就不可能维持一元的发展。两汉所确立的儒学独尊的发展局面必定会被打破，社会的意识形态出现多元化。在这种形势下，学术的发展也就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呈现出多元化的状况。最初是从汉末的清谈中衍生出玄学，玄学是对汉代经学的背离，是对经学僵化的反动，它在学术发展史上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它以道家的精神诠释儒学，以儒学的观念理解道家，是儒家与道家相互结合的结果。这种玄风影响了当时传入不久的佛教，般若学的讨论就带有明显的玄学的色彩。佛教以其高远、玄妙而胜玄学一筹，故逐渐取而代之。但是，政治上的分立也影响了学术的发展。西晋南迁之后，士子们随晋室南下，南朝成为文化的中心，学术的发展南方就带有更多的思辨性，更加关注学理性的问题。而北方由于是少数民族政权，文化底蕴不如南方深厚，学术的发展就更多的强调实践性、直观性。

国家的统一消灭了政治上的多元化，有利于学术思想的统一。它对隋唐学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是对儒学的复兴。儒学强调纲常名教，以维护既定的社会生活

秩序、实现社会完善为己任,在社会动乱的时候,既定的社会生活秩序被打破,无序的状况中才可能有新秩序的建立,所谓乱世出英雄,就是要从无序的状况中建立有序，但英雄的出世必须以社会的无序为前提，所以,强调秩序的儒学就必然被忽略,被束之高阁。但是,一旦新的社会秩序建立起来,在中国故有的各种学术思想中,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要数儒学最强，于是就会有对儒学的复兴。隋唐是如此,宋代也是如此。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将近 400 年被高搁的儒学在隋唐时期就有了一定的复兴与发展。隋唐两代的统治者，对儒学都持积极支持的态度。不管他们对佛教与道教持什么态度,但都没有抛弃儒学,而始终将儒学作为自己统治的重要思想基础和工具。隋唐时期科举制的确立和完善,虽然是为了选拔人才,是出于政治的目的,但考试科目的设置,却表明统治者对儒学的重视，反映他们认为只有儒学才是经邦济世的学说，客观上对儒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二是学术的融合。国家的分裂导致了学术倾向上的分歧，在政治多元化的社会中,这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相反,它反映了某个独立区域思想文化的独特性。但在统一的社会中，这种倾向就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因而,统一之后的学术融合就是一种必然趋势。这一趋势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佛教的学术发展。如上所述，由于南北在文化上的差异，佛教在南朝和北朝的学术状况也有明显的不同。南方佛教学者受玄学影响,比较注重佛教义理的思辨,慧观称最。而北方受少数民族统治者文化底蕴的影响,不了繁冗、高深的义理,而喜好简单明快的修持方法，禅定就得到大力提倡。其实,按照佛教义理,戒、定、慧三学不可偏废，过执一端,都非佛教真谛。所以,随着国家的统一,这种南北学术上的分歧就成为佛教发展的一种障碍,不少学者就致力于融合南北,最先确立宗派的天台宗人，就是从事这一工作的重要代表。

除佛教之外,儒学的情况也是如此。《北史·儒林传》说:"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

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南北儒学有同有不同,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南方儒学受玄学的影响,比较注重思辨性,而北方则固守汉儒的传统。隋代的二刘(刘焯、刘炫)学通南北,开融合南北之风。唐代李世民命孔颖达注疏五经,就是有感于义出多门,学者莫衷一是,所以才专门疏理五经,详加注说,并颁行天下,以为儒学的定本。其用意就是统一南北儒学,使学者有所依从。

2. 社会的兴衰对学术发展的重要影响

意识是存在的反映,学术思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尽管学术思想形成之后,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但其关心、探讨的问题,追求的理想、提倡的观念等等,都离不开现实的社会生活。甚至学术思想发展的特点,都受社会兴衰的影响。譬如,在长期的战乱中,人们处于紧张与危机之中,对生活和前途丧失信心,学术思想也会反映出一种悲观的情绪。而在社会兴旺发达的时期,人们生活幸福,安居乐业,对前途充满信心,在学术思想上就会反映出一种积极的态度。魏晋时期的玄风,南北朝佛教的兴起,道教的昌盛,都与当时的社会动荡有着密切的关系。儒学在隋唐的复兴,佛教宗派的确立,也与隋唐社会的统一兴盛息息相关。而文学的发展,更是直接反映出社会发展的脉搏。

如上所述,复兴儒学是统一的社会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需要,以儒学教育为例,隋唐两代官学都有一定规模的建设。隋朝立国之初,文帝就下诏曰:“古人之学,且耕且养。今者民丁非役之日,农亩时候之余,若敦以学业,劝以经礼,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岂止知礼节、识廉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顺者乎?始自京师,爰及州郡,宜祗朕意,劝学行礼。”① 隋初国家设五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隶

① 《隋书》卷 47《柳机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